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2003

论宋代风俗画中市井休闲意趣

刘垣杏

(浙江大学 哲学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宋代开放多元的社会文化氛围为市民阶层提供了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间中多样化的休闲实践, 随着休闲娱乐场所、休闲消费市场的不断完善, 宋代休闲文化成为中国休闲文化发展的高峰。其呈现出“狂欢化”“产业化”特征, 整体上完成了从精英化、贵族化向民间化、世俗化和大众化的转型。与此同时, 作为记录宋代社会生活包括休闲生活的重要视觉载体的风俗画获得了显著发展, 其题材扩展到城市市井平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其不仅是研究社会阶层互动的重要史料, 更是考察士人文化与市井文化在城市空间中交融的关键媒介。风俗画所呈现的休闲意趣, 表征了宋人对日常生活美学的追求、宋代休闲文化的世俗化转向及其蕴含的人文价值。

关键词: 宋代; 风俗画; 休闲文化; 市井休闲; 休闲意趣

中图分类号: J205; C91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6)02-0022-07

On the Leisure Aesthetics of Urban Life in Genre Paintings of the Song Dynasty

LIU Yuanx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open and pluralistic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Song Dynasty provided urban citizens with diverse leisure practices with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public space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leisure venues and leisure consumption markets elevated Song-era leisure culture to an unprecedented height in Chinese history. This leisure culture exhibited characteristics of “carnival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marking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from elitist and aristocratic to popular, secular, and mass-oriented forms. Concurrently, genre paintings—key visual records of Song Dynasty social life, including leisure activities—experienced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expanding their subjects to encompass various aspects of urban and commoner life. These paintings serve not only as crucial historical sources for examining social interactions across classes but also as vital media for investigat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literati and popular urban cultures. The leisure aesthetics depicted in these genre paintings reflect the Song people’s pursuit of everyday life aesthetics, signify the secularization of Song leisure culture, and embody underlying humanistic values.

Keywords: Song Dynasty; genre painting; leisure culture; urban leisure; leisure aesthetics

收稿日期: 2025-10-14

基金项目: 浙江省文化工程重大项目“中华和合文化通论”(26WH06ZD);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周易》自然美学思想研究”(23BZX044)

作者简介: 刘垣杏, 女, 四川宜宾人, 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

宋代不仅是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也是封建文化发展的高峰。商品经济繁荣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推动了宋代市民阶层的形成。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传统士人文化相互交织，带来了多样化的休闲活动和大众化的审美意趣。士人群体追求的雅文化、宫廷贵族追求的奢文化与市井百姓追求的俗文化在公共生活中频繁交融，造就了宋代休闲文化的独特风貌和审美意趣。宋代同时又是风俗画创作的高峰期，其题材广泛，包括市井百姓的衣食住行、娱乐祭祀、节日庆典等多个方面。风俗画作为一种记录日常生活的艺术形式，以生动的图像展现了当时丰富多彩的市井生活和休闲文化，《清明上河图》《货郎图》《杂剧图》《秋庭戏婴图》《大雉图》等作品，以市井百态的刻画、空间的细腻分布以及人物的生动描绘，将茶楼酒楼、庙会戏园等娱乐场所，七夕夜市等庆典场景，以及货郎渔樵、孩童嬉戏等人物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风俗画不仅是一种艺术创作和审美风尚，更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以往的研究论及宋代休闲文化多以士大夫群体为主流，本文则通过对宋代风俗画中典型休闲意趣的分析，将视线落在市井百姓身上，以此探讨宋代休闲文化由雅转俗的世俗化特征，以及其对市民阶层（尤其是元明一代）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宋代休闲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宋代在中国封建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它不仅是传统儒家文明发展的巅峰时期，而且还是中国历史“近世转型”的重要开端。邓广铭、漆侠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一方面，此前封建社会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取向，在宋代逐渐向以商品经济为支撑、城市生活为中心的格局转变。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这一时期，士大夫文化、人文思想以及休闲审美风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状态，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西方与日本史学界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时代。

伴随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其城市空间迅速扩张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乡村中心地位，城市生活成为宋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余英时曾提及，宋代的“士商互动”极大推动了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兴起，而这一新兴的市民阶层正是近世文化风气的重要载体和推动力量^[3]。在这种背景下，市井文化迅速崛起，以日常生活为核心的休闲活动频繁出现，人们开始更加关注个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需求，休闲活动呈现出鲜明的“人文化”和“世俗化”趋势。从流传下来的对宋代社会状况进行了翔实记录的史料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中可知，这种人本主义取向的凸显，使得宋代休闲文化体现出从贵族化、宫廷化逐渐走向市井化与生活化的趋势，休闲活动与文化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潮流。宋代风俗画、杂剧和词曲等艺术形式的兴盛，正是这种转折的具体表现。这时，审美趣味、休闲意蕴不再局限于典雅的士大夫圈子，而是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与大众休闲娱乐之中。宋代的社会变革及其获得的成就，客观上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对整个社会的休闲氛围以至休闲社会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政治上，宋代的统一结束了自唐末五代十国百年来的分裂与动乱局面，使得社会相对和平安定，整体上呈现“有外患而无内乱”的特点。内部长期的稳定状态，为宋代自上而下休闲生活的展开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宋代统治者奉行相对宽松的政策，给予士人群体高度的政治自由。在重文轻武政策影响下，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处境相当优越。政府同时在士人俸禄和闲暇时间上予以制度保障，这也客观上推动了士人阶层有闲阶级的产生，使得士人群体能够在较为宽松的生活节奏中从事文化、艺术、娱乐等休闲活动。对平民而言，北宋时期《皇官庄客户逃移法》的实施，使得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大幅弱化。到了南宋时期，租佃关系进一步变化，农民被直接登记到国家户籍，摆脱了过去对地主的私人依附。这种政治、人身层面的解放，对于平民来说意义深远，他们得以拥有更多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也使得不少农户摆脱土地束缚，迁入城市，从而加快了宋代城市化的步伐，并推动了市民阶层的形成与壮大。

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培育了休闲社会发展的土壤。政治的统一以及稳定的内部环境使得宋代生产力高度发展,经济的繁荣为休闲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就农业经济而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农村因农田规模扩大及科技的进步,农业效率提高而劳动力需求减少,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的状况,这成为农村人口外迁的“推力”;与此同时,工商业的发展,使得工商业及服务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增加,形成将农村富余人口吸引到城市去的“拉力”。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代政府引进“占城稻”,其生长期短、抗洪耐旱,适合大面积种植。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为城市居民及农村居民提供了稳定的生活保障,农村经济的稳定也使得大批劳动力流向城市,使得宋代城市化进程加速。宋代提倡鼓励种桑,使得江南一带成为重要的丝绸生产区。这一时期,经济作物、农副产品逐渐进入商业渠道。丝绸、陶瓷、造船等产业迅速发展,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口至东南亚、南亚等地。宋代政府重视商业的发展,推行“重商”政策,开设“榷场”(官方市场),规范交易活动,并通过海上贸易与周边国家进行物资往来,使得商贸活动更加活跃。此外,交子这一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的出现也推动了宋代货币经济的繁荣。在宋之前存在着“坊市制度”,城市中的“市”被局限在坊间,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宋时,坊市界限被打破,商铺甚至一度侵占街道影响正常的交通出行。晓市夜市的出现表明时间界限也被打破,推动商品经济的稳步发展。开封、杭州等商业城市成为当时的人口聚集中心,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职能更多由政治职能向经济职能转变。大城市周围近郊往往还发展出“草市”,供附近城镇居民进行商贸往来。宋代城市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财富,这客观上激发了城市居民对休闲消费的需求,促使休闲文化活动以不同的形式展开。休闲文化的孕育需要一定规模的休闲主体,而市民阶层的诞生与壮大满足了这一需要。有闲有钱的市民群体逐渐开始追求精神上的享乐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专门的休闲娱乐场所的出现,茶馆、酒楼、青楼、戏园等娱乐场所的兴起,为市民阶层提供了多种消遣方式。朱彧的《萍洲可谈》

中详细描述了杭州街市的繁华景象,记录了各类娱乐场所的生动面貌。钱穆指出:“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4]这一时期,休闲主体经历了从统治阶级到平民阶层,从知识精英分子到一般大众的转变,宋代社会也经历了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变,使得宋代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休闲城市和休闲社会。南宋时期,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政治中心随着经济中心南移,城市得以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南宋统治者偏安江南,缺乏积极收复中原的意愿,并对主张抗敌的士人加以政治压制,因而部分士人转向追求安逸享乐,刻意远离政治纷争,将注意力集中于闲适生活与自然风光,以此获得精神上的安慰。这种追求安乐闲逸的风气,由士大夫阶层逐渐向社会各个层面扩散,对南宋社会的休闲活动产生了广泛影响。

此外,宋代休闲文化的兴起以及休闲社会的形成也与其思想文化氛围有着直接关联。从思想史来看,三教合流在这一时期已大致成形。禅宗的盛行将安顿人的心灵、注重当下的生命体验的思想渗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部分理学家如邵雍、周敦颐等也有着崇尚自由、追求闲适的思想,这些思想深刻影响了知识阶层和士人群体休闲心态。私学与科举的进一步发展和下移,使得文化和教育更多面向普通市民群体。士人文人群体与平民的交往也影响了市井百姓对休闲生活的追求。

宋代休闲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呈现出由“雅”向“俗”的显著转向,与此前以宫廷贵族为主的奢文化、以士大夫为中心的雅文化相比,宋代的休闲文化具有更强的世俗性和大众化特征,是一种以市井百姓为中心的“俗”文化。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城市化的发展为宋时休闲文化的世俗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手工业与商业的发达使得城市人口集中,市民阶层的崛起带来了对休闲消费和娱乐形式多样化的广泛需求。茶馆、瓦舍勾栏、酒楼食肆等城市休闲场所的兴起,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经济实惠且易于参与的休闲方式。这些场所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士大夫阶层对休闲文化资源的限制与垄断,使得原本高雅的休闲活动从封闭的贵族空间走向开放的城市空间,实现了

从精英文化逐渐向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转型。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变还伴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在宋代，士大夫阶层逐渐接纳并参与世俗休闲文化的实践，文人词作、绘画和娱乐活动中频频出现市井题材。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市民文化相融合，进一步模糊了“雅”与“俗”的边界，使得市民文化体验成为一种跨越阶层的共同文化体验。

二、风俗画作中的休闲与审美意趣

宋代是风俗画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绘画不仅延续了前代统治者因“礼崩乐坏”而转向民间采集风俗素材的传统，以及辅助皇权实现教化功能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呈现了大量城市居民与乡村百姓真实而丰富的日常生活场景，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审美趣味。风俗画的题材涉及宋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市井习俗、休闲娱乐文化等。在人物画方面，其关注的对象已不再局限于帝王将相、贵族豪门或宫廷仕女，而更多地聚焦于文人士子雅集、儿童嬉戏玩耍、妇女纺织劳作、货郎渔夫樵夫的日常，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节庆活动。邓乔彬在《宋代绘画研究》中提到，宋人较唐人之所长的地方即“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风俗画”，“丰富的现实生活和众多人物，如农村的渔夫、田家、牧童、山樵，耕织、捕鱼、服田、耕获，城市中的岁朝、观灯、文会、货郎、夜市、杂剧、鬻弄，以及诸多如嬉婴、嬉春、戏鸟、扑枣等以儿童生活为主的作品，都是宋人所长而唐人未见或少见的”^[5]。宋代风俗画的蓬勃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密切相关。宋代都城开封、临安等城市的市井生活丰富多彩，市民阶层的休闲需求增加，宫廷和民间的绘画需求也增加。这一时期，张择端、李嵩、苏汉臣等画家致力于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各类场景，描绘人们的衣食住行、市场交易、祭祀庆典等休闲活动。

其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面上，满载商货的骆驼队缓慢行出城门，大桥旁边的摊贩正在售卖刀剪等杂物，负荷过重的大船由纤夫用力拉扯着前进……北宋都城汴京的日常休闲生活与习俗风情，在《清明上河图》的长卷中一一呈现。图中描绘了汴京城内外大大小小的酒楼、茶馆、食店等，反映出北宋时期休闲消费的兴旺。北宋酿酒业虽兴盛，但

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由于北宋农业改革带来的粮食产量增加，因而有富余作物可以用于酿酒，这是在此前少见的。北宋政府设置酒务机构，也允许民间“特许酒户”用官制酒曲酿酒及批发销售，这一类特许酒家被称为“正店”，《清明上河图》中的“孙羊正店”正是其中一例。其后院堆放有多层高酒埕，显示其酿酒及批发生意的兴隆。除此之外，还有近郊小径的小型酒铺，位于大码头、大路边的大型酒家，这些卖酒场所都必须注册登记，并按规定展示官方标识，如“正店”挂上青白色条子的方形酒旗等，并按销量课税。苏升乾点算出《清明上河图》中有122幢房屋。45幢楼宇用作商业用途，其中有酒旗的酒楼8幢，茶馆20多幢；另外，用于服务业及其他行业的29幢。餐饮业有着奢华的高档大酒楼及大众化的小饭馆。最高档的酒楼即“正店”，其有自己的名酒和招牌菜，如“孙羊正店”就以香醪和羊肉菜肴为特色^[6]。不过，《清明上河图》中最多的还是以大众消费特别是与漕运有关的低收入阶层民众为消费对象的茶馆与食肆。宋代酿酒业的繁荣与酒楼茶楼数量的增加，体现了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活跃，这也表明，休闲已成为宋代市井社会流行的生活方式；酒肆茶馆的兴盛，为公共娱乐与文化交流提供了理想的空间。市井大众以休闲的方式，积极追求世俗欢乐，彰显自由个性，增进社会交往。《清明上河图》中还描绘了北宋时汴京作为一个休闲城市的新型休闲场所——以满足大众休闲需求为目的的综合性娱乐场所“瓦子”或“瓦舍”。吴自牧《梦粱录》记载：“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即易合易散，没有阶级限制、来去自由之意^[7]。瓦舍建成后，内部用栏杆围起来供民间表演艺人演出，这种固定的表演场所，便称作“勾栏”。瓦舍以勾栏作为表演场所的核心，周边围有众多其他的摊档，可供商品贩卖、占卜或者医疗等。瓦子以及附近的茶楼酒楼、食肆妓院等，构成一个大型的城市综合娱乐区域。瓦子中最重要的表演技艺有十余种，如戏曲、曲艺、武术、杂技、说活、傀儡等，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小说”及“讲史”，其依据的文本也就是“话本”。话本从唐末寺院讲说佛经故事演变而来，文字朴实易懂，近乎口语，内容上多为民间志怪及历史传说。这样的说

书摊在《清明上河图》中非常常见,其多位于大路交叉点。这些话本故事也是后代元明清短篇、长篇小说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大众文学的基石。宋代人们另一种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是观看杂剧表演,南宋时著名风俗画作《杂剧图》(又名《卖眼药图》,现藏故宫博物院^{[8]38}),生动描述了这一休闲活动。宋时杂剧又称“滑稽戏”,其表演形式与今日的相声、小品、脱口秀等表演形式较为接近。《杂剧图》具体描绘了宋代戏剧场景中,副净、副末所演绎的游方郎中与眼疾患者的动作神态。左边郎中头戴高帽,身着长袍,腰间挂一枚绘有眼睛的布包,背后药葫芦也都有眼睛图案,造型滑稽。他手持药瓶,似在推销售卖。右侧买眼药之人,短衫上插一只小扇子,上方写一“浑”字,与郎中相互调侃。正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对当时着装所记载的:“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9]117}故宫博物院馆藏另一幅《打花鼓图》同样描绘了副净色、副末色两个人物进行杂剧表演的场面^{[8]39}。这两幅描绘杂剧的风俗画所展示的世俗主题相较前代更为直白,其表明,杂剧的滑稽、娱乐效果与百姓的生活需求十分吻合,宋代文艺在商品化背景下雅俗观念有了重大的变化。宋代还有一种常见的市井表演形式是木偶或傀儡表演,李嵩所作《骷髅幻戏图》^{[10]26}所绘悬丝傀儡演出,正是这一类。当时“骷髅”乃是一种习见的关于人的谐谑式隐喻,道家的齐物、佛家的涅槃等,都是骷髅幻戏的思想渊源。李嵩以提线傀儡木偶为视觉中心,描绘了左右两侧妇人哺乳和孩童嬉戏的不同场景。刘松年《傀儡婴戏图》也描绘了儿童耍弄木偶的画面,足以见当时傀儡戏作为休闲娱乐的普及程度之高,市民百姓对之兴趣甚浓。

宋代风俗画作尤其是人物画的题材相较前代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向,即对于市井生活中的少数群体如货郎渔樵、孩童妇女等有了更多的关注。故宫博物院所藏李嵩的《货郎图》生动地描绘了一位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售卖杂货的老货郎的卖货场景^{[10]114}——村里的妇女儿童纷纷围拢过来挑选商品,现场洋溢着欢快热闹的气氛。货郎担上层层叠叠,摆放了品类繁多的商品,宛如缩小版的超市,陈列着风车、山鼓、葫芦、花篮等专供孩子们玩乐的物品,也有木叉、犁耙等务

农工具,还有瓶、缸、碗、盆等居家用品,以及瓜果点心等食品。这幅画细致呈现了宋代乡村中欢乐、有趣的风俗场景,体现出当时市井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意趣,也反映出货郎这一职业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不仅方便了乡村生活,也推动了乡村地区休闲消费的兴起。苏汉臣的《秋庭戏婴图》则将视线放在了孩童游戏的场景上。画的左上角有乾隆所题绝句:“庭院秋声落枣红,拾来旋转戏儿童。”图画描写的正是“枣磨”这一游戏。“推枣磨”是一种历史悠久且富有趣味的传统益智游戏,在中原地区颇受喜爱。每年秋天是大枣丰收时节,这种时令游戏就成了孩子们的最爱。他们将捡来的新鲜红枣串在细小竹签的两头,做成类似“小扁担”的玩具,再取另一颗红枣切去一半,下方插入三根短竹签作为底座,露出的半粒枣核则恰巧成为转动扁担的支点。这种制作简单却充满智慧的小玩意儿便是“枣磨”。游戏的最大挑战和乐趣在于“推”的过程——玩家要让“小扁担”稳稳地旋转起来,且不能从枣核尖端滑落。一旦掉下来,即视为输掉游戏。画作把姐弟俩推枣磨时的动态和神情描绘得栩栩如生。画面左下方,姐弟二人以一只黑漆螺钿装饰的圆凳为游戏台面。右边的姐姐身着白衣、系着红带,眼睛紧盯着不断旋转的枣磨,双手不由自主地跟随旋转轻轻护着,十分担心“小扁担”随时滑落。左边的弟弟则一脸顽皮,穿着红色衣衫,悄悄将手探向枣磨,似乎准备出其不意地搞些“小动作”。他瞪圆眼睛,嘴角露出坏坏的笑容,仿佛其计谋马上就能得逞似的。在画面右侧的圆凳上,还摆放着红色佛塔、人马转轮、棋盒、陀螺等各种精致的玩具,一副小巧玲珑的铜铙钹随意散落在地上。此刻,姐弟俩已完全沉浸在“推枣磨”的紧张与欢乐中,对于这些精美玩具视若无睹。可以说,苏汉臣创造了一幅表现宋代孩童嬉戏、休闲欢乐的经典图像。

《清明上河图》突出了宋代休闲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休闲体育。其主要以“上河”为中心描绘了宋人外出郊游、踏青祭扫的休闲活动,以及荡秋千、射箭、相扑、武术、下棋、钓鱼、放风筝等与休闲体育相关的娱乐活动。踏青这一休闲运动在宋代已经全面融入节日习俗中,这与《东京梦华录》在“清明节”一章中所记载十分一致:“都城人出郊……土庶阨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

用纸裱叠成楼阁之状。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各携枣锢、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谓之‘门外土仪’。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9]¹⁶⁹南宋画家马远所作《踏歌图》^[10]¹⁶⁰⁻¹⁶¹也描绘了这一休闲活动，其表现的是雨后天晴的京城郊外的景色，以及丰收之年农民在田埂上踏歌而行的欢乐情景，其也是民间春日清明寒食踏青游玩的重要习俗。《踏歌图》上端显著位置有题诗：“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陇上踏歌声。”这幅风俗画既表达了“击壤鼓腹”的典型宋画主题，又体现了南宋寒食节之“击壤”踏歌的休闲文化意蕴与节日传统^[11]。

此外，描绘民间风俗习惯、节日庆典的绘画在宋代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大傩图》即一幅描绘古老的驱除痼疾的民间风俗画作^[12]。《论语》中就有“乡人傩”的记载。《后汉书》记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侏子。”^[13]唐代《乐府杂录》中描写说：“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黄金为四目。衣熊裘，持戈，扬盾，口作傩之声以除逐也……侏子五百，小儿为之，衣朱褶青襦，戴面具。以晦日于紫宸殿前傩，张宫悬乐。”^[14]这些描述基本与画作的内容相似。到了宋代，平民百姓在“傩”时增添了许多农具，其除了祛除疾病的祈求之外，还增添了祈盼丰收的意味。这同时也是一种民间娱乐活动。画面上一共描绘了12个人物，他们各自穿着奇特夸张的服装，头上戴着各种样式的帽子，并装饰着花枝。这些帽子各具特色，没有重复的，除了常见的斗笠、头巾和帽冠之外，还有一些是用粗犷兽头造型装饰的；也有取材自乡村日常器具的，如簸箕、斗、箩筐等。他们手中或随身携带的物品也多种多样，有敲击用的鼓、铃铛、檀板等乐器，也有扇子、竹篾、扫帚等日常工具，以及花枝和瓜果之类的装饰物。此外，这12人面部都进行了特殊化妆，或许戴着面具。他们围成一圈，边舞边跳，整个场景洋溢着浓郁的喜庆和欢乐气氛。有学者认为，《大傩图》图中人物各执农具所行之事并非傩舞，而与民间社日祭祀相关的社火舞队表演有关。这样热闹诙谐、具有浓郁祭祀色彩的表演，为民间社日休闲

活动增添了无限欢乐的气氛^[15]。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描绘汴京城内“自安业界北头至潘楼竹木市”一带的七夕夜市盛景，“状其浩穰之所，至为精备”^[16]。宋代金盈之在《醉翁谈录》中就写到：“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17]可见，从农历七月一日开始，车马就已经通行困难；到七夕前三天，交通就已经完全堵塞了。由此可以看出，古时七夕节的热闹程度和人们的重视程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百姓参与节日庆典、享受休闲假日的愉悦心情。

三、宋代休闲文化特征

宋代市民阶层休闲文化有着鲜明的特征，潘立勇将其归纳为：狂欢化、产业化和市场化，以及民间化、大众化、世俗化^[18]。这些特征体现在风俗画的题材和内容细节中，深刻反映了宋代民众特有的审美休闲倾向和社会文化心理。

《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街市热闹场景中，各类摊贩云集，杂技、百戏、说书等娱乐活动随处可见，一派狂欢氛围。场景里的人物姿态随意自然，表情生动而夸张。人们或围观起哄，或大声叫卖，或游戏嬉戏，整个城市空间显现出节日般的欢乐气息。这种狂欢氛围体现了市井民众对于日常休闲生活的重视。风俗画成为生动反映宋代市民阶层心理诉求和情绪表达的重要载体。市井休闲中的“狂欢”并非简单的热闹喧嚣，而是表现出一种超越日常规范、暂时抛却等级秩序的社会心理状态。彼时，官僚大臣、文人士大夫与市井百姓一同出入娱乐场所，观看节目演出，其消弭了以往尊卑有别、上下等级森严的关系，呈现出平等娱乐的休闲景观。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商业的兴盛，各种与休闲消费相关的产业迅速形成。风俗画中频繁出现的货郎、酒楼茶馆、瓦舍勾栏等，都体现了休闲活动的商业化与产业化发展状况。《货郎图》中的货郎挑担走村串户，售卖包括儿童玩具、日用品和食品在内的各种商品，所到之处皆引来妇孺的热烈围观和购买。这种流动商贩不仅满足了市民日常生活与娱乐的消费需求，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商业网络的发展。《东京梦华录》等文献亦翔实记载了东京汴梁商业街

区的繁华景象,诸如相扑、杂剧等娱乐表演成为商品化经营的重要形式,这些场所形成的娱乐产业链为市民提供了更加多元的休闲选择。风俗画对此类场景的描绘,不仅彰显了休闲活动产业化的具体细节,也暗示了休闲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互动关系。此外,相较于唐代以前休闲娱乐以贵族阶层和文人雅士为主,宋代休闲活动的主体逐步向普通市民阶层扩展,风俗画敏锐地捕捉并展现了这一历史转变的诸多细节。画作中的主人公多为普通市民,他们的日常活动和休闲娱乐场景成为画面描绘的核心。各类游戏、集市购物、民俗表演等生活化情节被频繁而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不仅体现了画师对市井生活的细致观察与精妙刻画,更彰显了宋代休闲文化逐渐从精英阶层的专属领域走向大众领域的过程。这种转型并非简单的文化下移或普及,而是在城市化、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演变,是宋代社会文化世俗化与平民化趋势的集中体现。

宋代休闲文化由“雅”向“俗”的转变,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场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变不仅塑造了宋代社会的文化面貌,也对后世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宋代形成的休闲文化模式为明清市民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宋代的世俗文化扩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使其更加多元化和包容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过程展示了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当社会经济和技术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文化势必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从高雅转向多样化。这种规律不仅是宋代文化兴盛的重要原因,也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演变的关键视角。总之,宋代休闲文化的世俗化转向,不仅是一个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更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重塑。这种由“雅”转“俗”的文化实践,体现了文化的开放性与创造力,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深入研

究宋代风俗画中的市井休闲意趣,对于深化当今中国社会的休闲文化研究不无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邓广铭. 漆侠. 宋史专题课[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4.
- [2]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277.
- [3]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527-528.
- [4] 钱穆. 理学与艺术[M]//宋史座谈会宋史研究集编辑小组. 宋史研究集: 第7辑. 台北: 台湾书局, 1974: 2.
- [5] 邓乔彬. 宋代绘画研究[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 56.
- [6] 薛凤旋. 清明上河图: 北宋繁华记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67-73.
- [7] 吴自牧. 梦粱录[M]. 符均, 张社国, 校注.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4: 294.
- [8]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 宋画全集: 第1卷第7册[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 [9]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M]. 王莹, 注译.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6.
- [10]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 宋画全集: 第1卷第4册[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 [11] 傅慧敏. 感召和气, 以致丰穰: 《踏歌图》新探[J]. 美术观察, 2022(10): 48.
- [12]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 宋画全集: 第1卷第6册[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220-223.
- [13]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931.
- [14] 段安节. 乐府杂录[M]. 卞娟莉, 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8-20.
- [15] 冯文华. 宋代“村田乐”画题与社日民俗考[J]. 艺术与民俗, 2023(4): 84.
- [16] 刘道醇. 圣朝名画评: 五代名画补遗[M]. 徐声, 校注.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7: 59.
- [17] 金盈之, 罗烨. 新编醉翁谈录[M]. 周晓薇, 校点.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15.
- [18] 潘立勇, 陆庆祥. 宫廷奢雅与瓦肆风韵: 宋代从皇室到民间的审美文化与休闲风尚[J].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29(1): 79-80.

责任编辑: 黄声波